簡報

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

2015 年第 3 期（总第 34 期 ）　　2015 年 7 月 15 日

学术活动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吴疆教授来我宋学中心讲学

5 月 13 日下午 1:30，应宋学研究中心冯国栋教授邀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东亚系教授吴疆来我中心访问讲学。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行政楼 229 会议室，吴教授为我校及兄弟院校五十余师生作了题为“唐代禅僧‘天王’道悟与‘天皇’道悟的前世今生：试论中国禅宗史上有关佛教文献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冯国栋教授主持。

吴教授指出：有关唐代禅僧“天王”道悟与“天皇”道悟身份真伪的争论是中国禅宗史上的一大公案。从宋初到清初的几百年间，有关这一问题的僧诤不断，甚至波及到日本。尤其在十七世纪，随着禅宗在东亚大陆的崛起，这一本来属于文献考证范围的实证问题，成为僧人聚讼的焦点。以浙江天童寺密云圆悟禅师为中心的临济宗力主两道悟说，并依此在《五灯严统》等新撰灯谱中篡改禅宗的世代法系，由此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法门论战。 吴教授重点介绍了唐代禅僧“天王”道悟与“天皇”道悟的问题在禅宗史上的意义，并概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正反论据。吴教授认为虽然这一僧诤的表现形式是考据学，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禅宗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讲座最后，吴教授提出两个问题：1、是否可以后代史料考证前代历史？2、佛教考证学是否成立，它与清初考据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引发大家的深度思考与讨论。

随后，冯国栋教授对吴疆教授的精彩讲座作了总结与评论，在场的各位师生也与吴教授深入探讨与交流。

基地要闻

宋学中心召开2015年度省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工作座谈会

2015年5月20日，宋学研究中心2015年度省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工作座谈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行政楼宋学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冯国栋教授、董平教授、关长龙教授、祖慧教授、何善蒙教授等出席了此次座谈会。中心主任陶然教授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由中心副主任冯国栋教授代为主持。

会上，冯老师首先传达了省社联关于本年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工作部署要求，介绍了本年度基地课题将分为常规性课题和竞争性课题，其中常规性课题是指根据基地上年度考核及结题情况确定的立项课题，每个重点基地原则上为3项，竞争性课题是指根据今年课题申报的数量与质量确定的立项课题，一般为0至4项。同时，在董平教授的建议下，与会各位老师一起完成了本年度课题申报指南的调整修改，确定了本年度课题申报的具体范围。

2015年度宋学研究中心省基地课题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相关通知与要求将发布在中心网站，欢迎宋学领域研究人员积极申报本年度省基地课题，课题申报将于六月底截止，届时中心将举行课题申报第一轮专家评审会。

宋学中心召开2015年度省基地课题评审会议

2015年6月29日，宋学研究中心召开201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评审会，董平教授、陶然教授、冯国栋教授、关长龙教授、祖慧教授、何善蒙教授等出席。会议由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董平教授主持。

董平教授首先介绍了本年度申报我中心省基地课题的基本情况，阐明了本次省基地申报课题进行首轮专家初审的要求与标准，即申报课题需围绕宋学研究中心课题指南及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中心将依据课题设计的质量，客观公正地评选出角度新颖、论证深入、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课题。

本次年度基地项目，中心收到省内外申报课题共22项。通过审查评议，并结合3位外校专家的通讯评审意见，中心评审组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了15项初审入选课题，其中来自浙江大学的课题9项，来自省内外其他高校的课题6项。初审结束后，近日将向省社科联科管处进行课题报送。

科研成果

龚延明教授“南宋文官徐谓礼仕履系年考释”

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

编者按：《中国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刊载发表我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南宋文官徐谓礼仕履系年考释”一文，现将该文内容提要摘录于下：

该文是对《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解读。解读选取的视角，是依据出土官告文书，对徐谓礼三十年仕履，按年、月、日，将其历任差遣、职事官与相应的官衔，进行了梳理、整合和考释，使这个南宋名不见经传的中层文官的仕履得以复原，期有助于深入解读《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并有助于从中了解南宋官荫制、官职迁转、除授、考课以及官衔结构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

龚延明教授“宋代四万进士档案的重构”在《新华读书报》上发表

编者按：我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宋代四万进士档案的重构”一文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在《新华读书报》上公开发表。现将该文部分内容摘录于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龚延明教授先后向高校古委会、国家社科规划办申请《宋登科记考》和《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课题批准立项后， 龚延明教授和祖慧教授的团队历经近二十年努力，继２００９《宋登科记考》出版后，今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第一份硕果———1000 万字、十四册的«宋代登科总录»，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宋代登科总录》相较（宋登科记考》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增加了书证，使四万一千多个宋代登科人的小传都有了文献资料的支撑。

宋代三百多年，共举行了１１８ 榜科举考试。然而，保存完整的登科录，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所载进士分别为３３０ 人、６０１ 人，这还是得益于朱熹、文天祥的名人效应。除去这二榜，仍缺１１６ 榜登科录。我们完成的１４ 册«宋代登科总录»，首次提供了一份两宋 118 榜登科录。虽然，由于两宋科举文献在宋金战火中散佚，已不可能完全复原宋代每一榜登科录，但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总共搜集了 41040 登科人。可以说已恢复了三分之一的登科录，重构了宋代四万多进士的档案。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宋代登科人物最大数据库。

《宋代登科录》所收每一个登科人，都有一份小传，即凡从现存文献中能辑录到的宋代登科人，按朝代、榜次顺序，列其姓名，姓名下列字、号，籍贯，登科年，初授官，所历官（举例）及终任官（或

最高官），谥号。小传之下，附书证。书证，写明哪一朝作者、书名、卷次及与小传有关信息的原著引文。书证尽量做到三条以上。举例如下：

【李垂】字舜工， 博州聊城县人。 咸平三年登进士第，初授闻喜县尉。 天禧四年, 任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 仕至知均州。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七《 李公(垂) 墓志铭》:“ 公讳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 咸平中举进士，初命解州闻喜尉，换州司法，再调湖州录事参军。 召试为崇文院校勘，出知亳、颍、晋、绛、均五州事， 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终于武当。”

《宋史》卷二九九《李垂传》:“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进士第。自湖州录事参军召为崇文校勘，累迁著作郎、馆阁校理,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

《北京图书馆藏拓片□墓志》６４８９、公孙简«《赵郡李君(筠) 墓志铭•天禧四年十二月》:“ 君讳筠,字质素,博州聊城……生三男：季曰垂，举登科第。习知官守，今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咸平三年，垂擢进士第。”

雍正《山东通志》 卷一五《 选举志·宋制科》:“ 李垂,，聊城人， 起居注。”

由上可知，小传所提供信息及书证，需要从多种渠道通过查阅文献获得。为此，我们翻阅了上千种以上文献。历经了“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资料的种种磨难。这些已逝的登科人，大都是曾经在宋代叱咤风云的精英，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与苏辙兄弟、王安石、沈括、苏颂、李纲、宗泽、朱熹、文天祥等等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窥见宋代科举制度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宋代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最为光采夺目的文化。科举文化流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

《宋代登科总录》问世了，为宋代科举史研究提供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数据。 希望它能为推动宋代科举史以及相关学科(宋代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社会学史、经济地理学、人才管理学等)的深入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

宋代四万进士档案的重构

■龚延明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先后向高校古委会、国家社科规划办申请《宋登科记考》和《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课题批准立项后，我们的团队历经近二十年努力，继2009《宋登科记考》出版后，去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第一份硕果———1000万字、14册的《宋代登科总录》，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宋代登科总录》相较《宋登科记考》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增加了书证，使四万一千多个宋代登科人的小传都有了文献资料的支撑。

宋代三百多年，共举行了118榜科举考试。然而，保存完整的登科录，只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所载进士分别为330 人、601 人，这还是得益于朱熹、文天祥的名人效应。除去这二榜，仍缺116 榜登科录。我们完成的14 册《宋代登科总录》，首次提供了一份两宋118榜登科录。虽然，由于两宋科举文献在宋金战火中散佚，已不可能完全复原宋代每一榜登科录，但经过我们多年的努力，总共搜集了41040位登科人。可以说已恢复了三分之一的登科录，重构了宋代四万多进士的档案。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宋代登科人物最大的数据库。

《宋代登科录》所收每一个登科人，都有一份小传，即凡从现存文献中能辑录到的宋代登科人，按朝代、榜次顺序，列其姓名，姓名下列字、号，籍贯，登科年，初授官，所历官（举例）及终任官（或最高官），谥号。小传之下，附书证。书证，写明哪一朝作者、书名、卷次及与小传有关信息的原著引文。书证尽量做到三条以上。举例如下：

【李垂】字舜工，博州聊城县人。咸平三年登进士第，初授闻喜县尉。天禧四年，任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仕至知均州。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七《李公(垂) 墓志铭》:“公讳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举进士，初命解州闻喜尉，换州司法，再调湖州录事参军。召试为崇文院校勘，出知亳、颍、晋、绛、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终于武当。”

《宋史》卷二九九《李垂传》:“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进士第。自湖州录事参军召为崇文校勘，累迁著作郎、馆阁校理，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

《北京图书馆藏拓片□墓志》6489、公孙简《赵郡李君(筠) 墓志铭·天禧四年十二月》:“君讳筠，字质素，博州聊城……生三男：季曰垂，举登科第。习知官守，今尚书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咸平三年，垂擢进士第。”

雍正《山东通志》卷一五《选举志□·宋制科》:“李垂，聊城人，起居注。”

由上可知，小传所提供信息及书证，需要从多种渠道通过查阅文献获得。为此，我们翻阅了上千种以上文献，历经了“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资料的种种磨难。这些已逝的登科人，大都是曾经在宋代叱咤风云的精英，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与苏辙兄弟、王安石、沈括、苏颂、李纲、宗泽、朱熹、文天祥等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窥见宋代科举制度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宋代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最为光彩夺目的文化。科举文化流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

《宋代登科总录》问世了，为宋代科举史研究提供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数据。希望它能为推动宋代科举史以及相关学科(宋代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社会学史、经济地理学、人才管理学等)的深入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临末，占小诗一首：

盛年意气冲霄汉，
敢揽课题三千万！
三千万字登科录，
贯通一千三百年。
追踪当年登科人，
经史子集须搜遍。
青灯黄卷伴寂寞，
“上穷碧落下黄泉”。
十万进士回眸处，
廿载心血凝其间。
《总录》工程何其大，
今日交出第一卷：
名曰《宋代登科录》，
集合进士达四万。
钱江奔腾东入海，
岁月易逝不复还。
上个世纪黑发人，
新世纪中白发苍。
物欲横流拒门外，
兀兀穷年为哪般？
振兴中华应有责，
传承文化敢担当！

龚延明　祖慧编撰《宋登科总录》(1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中华读书报》发表龚延明教授“南宋官员委任状真迹首度露面--司马伋、吕祖谦官告的解读”

编者按：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南宋官员委任状真迹首度露面--司马伋、吕祖谦官告的解读”一文于2015年5月20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以“文书治天下”是中国古代官制的重要特征。文书的规制不仅能够反映政治制度，更能反映出制度运行的具体流程。现存古代中央机构的文书非常少见，此次发现的南宋著名官员司马伋、吕祖谦官告，书仪格式保存完好，对学术界、文化界研究探讨宋代官制及其运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文献。现将该文章部分内容摘录于下：

2011年，南宋武义徐谓礼墓出土徐谓礼录白告身、敕黄、印纸文书，共十二卷，其中告身二卷十三件。2013年，包伟民、郑嘉礼编《南宋武义徐谓礼文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成了宋史学术界轰动一时的盛事。比之唐代，宋代新出土的文献实为罕见，因此显得特别珍贵。这批新材料，对深入了解宋代官文书的格式和运作流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原始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宋代制度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唯一不足的是，它不是真迹官文书，而是录白文书，即是手抄副本。那么，比如官员的官告，到底是什么样子？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还是一个问号。

值得庆幸的是，秘藏于域外的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和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曾孙司马伋的真迹官告，最近重见天日、公布于世。此次发现的吕氏、司马氏真迹官告与徐谓礼录白官告，构成了互为参证的双璧。奇迹的发生悄然而至，真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喜悦！

司马伋，字季思，陕西夏县人，司马光曾孙。他留下的这份官告，是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任命他为“总领淮西江东总领所总领、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的官告，这是个官位不高而权责很重的差遣。当时南宋有四大总所，淮东总领所为其中之一，近于现在大军区后总后勤部，保证军马钱粮供应；“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这实际是对皇帝直接负接的监察统制司（查当于大军区）长官行动的间谍工作；“兼提领措置屯田”是例行公事，管辖下屯田。现把该官告制词、告身迻录如下：

（一）制　词

敕：右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司马伋：中户三家之赋，仅活一兵步卒五人之粮，可赡一骑。此前史养兵之论，亦后人计费之言。悉仰给于度支，宁不伤于国力？然则统之民部，临以王官，庶乎其宜也。以尔性有通方，才无滞用，以大贤之后，为当世之称。前者，占兰省之名郎，赞天官之武选，条理甚精，奸欺不生，式畴尔能，可司军赋。爰以国计之重，遂正版曹之名，委属盖优，钦对毋怠，可特授依前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赐如故。

奉

敕：如右。牒到奉行。

（二）　告

告：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赐绯鱼袋司马伋　奉

原淳熙五年九月吕祖谦恩转朝散郎官告拼合图

“以文书治天下”是中国古代官制的重要特征。文书的规制不仅能够反映政治制度,更能反映出制度运行的具体流程。现存古代中央机构的文书非常少见,此次发现的南宋著名官员司马伋、吕祖谦的官告,书仪格式保存完好,对学术界、文化界研究探讨宋代官制及其运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文献。

南宋官员委任状真迹首度露面!

——司马伋、吕祖谦官告的解读

■龚延明

秘藏于域外的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和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曾孙司马伋的真迹官告,最近重见天日,公布于世。

2011年,南宋武义徐谓礼墓出土徐谓礼录白告身、敕黄、印纸文书,共十二卷,其中告身二卷十三件。2013年,包伟民、郑嘉礼编《南宋武义徐谓礼文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成了宋史学术界轰动一时的盛事。比之唐代,宋代新出土的文献实为罕见,因此显得特别珍贵。这批新材料,对深入了解宋代官文书的格式和运作流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原始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宋代制度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唯一不足的是,它不是真迹官文书,而是录白文书,即手抄副本。那么,比如官员的官告,到底是什么样子?又是用什么材料制成?还是一个问号。

值得庆幸的是,此次发现的吕氏、司马氏真迹官告与徐谓礼录白官告,构成了互为参证的双璧。奇迹的发生悄然而至,真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喜悦!

司马伋,字季思,陕西夏县人,司马光曾孙。他留下的这份官告,是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任命他为“总领淮西江东总领所总领、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的官告,这是个官位不高而权责很重的差遣。当时南宋有四大总所,淮西总领所为其中之一,近于现在大军区后总后勤部,保证军马钱粮供应;“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这实际是对皇帝直接负责的监察统制司(相当于大军区)长官行动的间谍工作;“兼提领措置屯田”是例行公事,管辖下屯田。现把该官告制词、告身逐录如下:

制 词

敕:右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司马伋:中户三家之赋,仅活一兵步卒五人之粮,可赡一骑。此前史养兵之论,亦后人计费之言。悉仰给于度支,宁不伤于国力?然则统之民部,临以王官,庶乎其宜也。以尔性有通方,才无滞用,以大贤之后,为当世之称。前者,占兰省之名郎,赞天官之武选,条理甚精,奸欺不生,式畴尔能,可司军赋。爰以国计之重,遂正版曹之名,委属盖优,钦对毋怠,可特授依前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赐如故。

奉

敕如右。牒到奉行。

告

告:右朝散郎、尚书户部员外郎、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赐绯鱼袋司马伋奉敕如右。符到奉行。

如上所引,宋代官员官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除授制词,由中书舍人起草的称外制。司马伋制词属外制制词。从官告签名“中书舍人𣈶”,可推知是中书舍人黄𣈶书行(起草放行)。制词是阐明奉敕任命司马伋为淮西总领的缘由,一方面说总领所总领担当供应军马钱粮之责任重大,“悉仰给度支,宁不伤国力乎?”“度支”是户部度支司,泛指国库。其意是要总领除了仰给国库支拨钱粮外,还要广开财源(如屯田),减轻国家负担。那么,如此重任,挑选你司马伋来做,是因为司马伋“性有通方,才无滞用,以大贤之后,为当世之称”,即说司马伋具有通达事理的才干,又是“大贤”司马光之后,名重当时,云云。制词末尾谓“奉敕如右。牒到奉行。”“奉敕”,指三省奉皇帝敕命。“如右”,即如上面所述。“牒”是同级文书,门下省将“敕命”牒送到尚书省,尚书省再“付”吏部。

二是“告”,“告”就是任命司马伋为“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兼提领措置屯田”差遣的正式通知,官方语言专称“告”。这个正式任命通知由谁下发呢?是吏部。所谓“符到奉行”,“符”,是吏部下发的一种文书。告要下发给官告院。“符到奉行”,就是官告院官收到吏部文书“符”之后,得立即执行。负责官告院的主管官,将吏部颁下的除授司马伋官的官告文字(包括制词与告),按规格制作成官诰。官诰书写在绫锦纸(丝绸质地)上,共7幅。因司马伋寄禄官为右“朝散郎”,带“左”表示进士出身,带“右”不非进士出身。司马伋是靠官荫入仕。朝散郎是七品官,官品不高。因此其所制官告的规格列入中绫纸一等,为七张。宰相用金花绫纸十八张,规格最高。司马伋官告七张绫纸在裱时,已粘连成一长幅,卷在大牙轴上,系上色带。然后,发给受告人司马伋。

上面所解读之司马伋官告格式,经与武义出土的徐谓礼文书中的录白告身、及真迹吕祖谦《淳熙五年九月·吕祖谦恩转朝散郎告》的格式相比较,基本吻合。略有不同的是,吕祖谦官告是寄禄官迁转,用词略有区别。

吕祖谦官告制词已残缺,我经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现给予复原。真迹原告文字:

[此前空阙]

□□□□□□□佐郎兼国□编修官兼权礼□郎官□□□□□□□□□□□□□□郎秘书丞兼□□郎官黄洽等列□图□□□□□□史氏之官 □□□之选储为异日之□□仰上皇帝之睿谟举行绍兴甲子之缛典载临秘馆□□储延见群士赐□□□□□荣宠居官其间进秩一等稽之彝章允为异数朕之所以稽古右文礼贤□□□意于此见矣尔其精一白一心图厥报称以永有辞

□□前件

(权中书舍人郑丙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 □□年九月二十七日

经复原淳熙五年九月吕祖谦恩转朝散郎制词:

朝奉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吕某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行秘书省著作佐郎秘兼国史院编修官。

勅承议郎、秘书丞兼权吏部郎官黄洽等:列职图书之府参联史氏之官,皆极一时之选,储为异日之用也。朕仰上皇帝之睿谟,举行绍兴甲子之缛典,载临秘馆,钦阅宝储,延见群士,赐宴赋诗,以侈荣宠。居官其间,进秩一等。稽之彝章,允为异数。朕之所以稽古右文,礼贤下士之意,于此见矣。尔其精白一心,图厥报称,以永有辞。

可依前件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熙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权中书舍人郑丙行

从吕祖谦官告文书可以看出,他的除官制词末尾加有“可依前件”,这是因为该制词同时有黄洽等人,因此开头增有一个脑词,“朝奉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吕某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行秘书省著作佐郎秘兼国史院编修官”,这是专门针对吕祖谦说的,与黄洽无关。黄洽所迁寄禄官不同。故尔,制词结尾特别说明“可依前件”,与开头脑词相呼应。最后“权中书舍人郑丙行”,是指此官告由权中书舍人郑丙“书行”,即由郑丙起草放行的官告。

又,司马伋官告是乾道二年颁发,其签署的执政官头衔,尚有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等三省长官。然而宋孝宗乾道八年,罢三省长官,以左右丞相为宰相。因此,在孝宗淳熙后的吕祖谦官告与徐谓礼官告中,三省长官头衔消失了,为左右丞相所取代。

乾道二年司马伋的官告签名列有三首长官,实际上三省长官都没的任命,空阙。是徒具空名而已,宰执官签字的仅有参知政事(副宰相)魏杞,他签字只签名字,无姓,见下:

侍中　阙
中书令　阙
参知政事　杞(魏杞)
尚书令　阙
尚书左仆射　阙
尚书右仆射　阙

下面所引的是淳熙五年九月吕祖谦恩转朝散郎制词宰执官签名:

少(保)(右)丞相　浩(史浩)
参知政事　雄(赵雄)

这里已不见三省长官官衔,而是左丞相史浩与右丞相赵雄的签名。

综上所述,真迹官告文书的发现,为研究宋代官文书运作,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档案,学术意义重大。

省重点研究基地浙大宋学研究中心

主编:陶　然

编辑:樊 婷

2015 年 **07** 月 **15** 日